

星火



25

第 7 辑

革命回忆录

XINGHUO

星 火

• 革命回忆录 •

第 7 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沈阳

星 火

Xinghuo

(第七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4,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10 $\frac{1}{2}$
印数: 1—4,6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慧

责任校对: 周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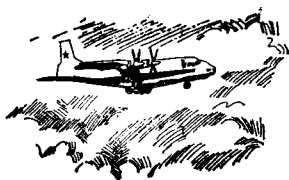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勤 学

统一书号: 3090·685

定价: 0.91 元

目 录

“九三”胜利后来东北	伍修权 (1)
回忆党中央对夺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曾克林 (20)
在接管沈阳市公安局的日子里	赵濯华 (33)
挺进东北四个月	王志远 (50)
高歌挺进	凌少农 (64)
在敌群中	朱士良 (80)
水泉剿匪	郭宝恒 (121)
智送情报	靳治国 (137)
回忆解放北票的战斗	刘益民 (146)
在杨靖宇将军身边	王传圣 (154)
回忆李兆麟同志	金伯文 (188)
与王汝起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	彭施鲁 (214)
抗联女战士陈玉华	王一知 (228)
英雄的少年连 ——回忆抗联三军司令部片断	于保合 (241)
白山密林中	蒋泽民 (248)
旧地重游话当年	王逸伦 (264)
江城春潮 ——忆吉黑邮务工会的斗争	王 群 (285)



“九三”胜利后来东北

伍修权

一、到 东 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一架涂着红五星的飞机来到延安上空，绕着延安飞行了几圈以后，就在机场上降落下来。中央马上派人去机场迎接来人，因为已经看出来的是苏联飞机。下来的是一名苏军大校和一名中国同志。那位中国同志是我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当时曾克林和李运昌的部队已经进了沈阳，并与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苏联远东司令部为和我党中央联系，决定派一名大校，由曾克林陪同，乘飞机来延安。他十五日到达，十六日就与我党中央会谈，希望中央很快派负责同志去东北，以便协调我方与苏军的行动。中央经过讨论，当天就作出决定，派六位同志乘这架飞机去东北。这六位同志是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因为苏联方面有军衔，我们为着工作方便，同他们打交道也要有相应的军衔，就以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我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和为上校，还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十六日晚上，叶剑英同志正式通知我，他向我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说明天（十七日）早上就动身，还关切地说我家里的事情，可以由他负责照料，让我放心

地走。

九月十七日，我们乘着那架苏联飞机飞向东北。但是飞机没有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飞行员很不谨慎，是从跑道中段落下的，结果冲出了跑道，倒插到一块稻田里。飞机尾巴已翘起来，成了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个人中，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受了轻伤，叶季壮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撞翻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苏联同志马上把我们一一救出来。首先将压在叶季壮身上的东西搬开，然后把他抬到平地上躺下。就在这时，我方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带了一个班赶到了，见到我们这种情形，他首先安排我们休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第二天，他专门派了一趟列车，送我们到沈阳。

正是九月十八日，我们坐着朱其文派的专车到了沈阳。曾克林和李运昌同志给我们安排了暂时的住处，随后我们又搬到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以后又搬到沈阳三经路博物馆。那是一处堡垒式的洋房，中间一座大屋给我们办公用，围墙四周是整齐的平房。恰象营房，正好住了一个连的警卫。

到沈阳以后，陪我们来的苏军大校就回自己的司令部汇报去了。很快，我们也与苏联军方取得了联系。当时苏联在沈阳的最高负责人是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柯大将，他的军委委员是杜曼宁中将。苏联军队都是这样，军事首长的军衔都比较高，军委委员则比较低。赫鲁晓夫当时也只是个中将，勃列日涅夫才是个少将，杜曼宁这个中将军衔也就算不小了。他们的总部在长春，由苏军驻在沈阳的部队专门和我们联系。我们同杜曼宁建立了经常联系，每次接触都是我陪同彭真去的。当时彭真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

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两周以后苏军又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结果弄得我们很被动。出关接收这批武器的部队已经到达，但由于情况变化，他们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那时中央向东北派来了十万军队和干部，在很短时期内扩大到三十万人。成分可能不纯，人数却不少。这批新到和新扩大的部队打开了几个很大的军用品仓库，搞到些新枪和很多装备。叶季壮同志亲自去看了，里头有大衣、服装、鞋子、帽子等物资，东西多得很，可以尽量去拉，部队趁机装备了一下。以后苏军一变卦，没办法再拉，后来的部队就得不到了。接着李运昌带的部队向热河转移，转移中，从仓库中带走了很多物资，可是没有很好地组织人押运，动员了一些马车帮部队运输，结果有的连车带物资都被人家拖跑了。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林彪后来也拿此事来攻击彭真；李运昌也大受批评，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李运昌还为此事向中央写了较为详细的申辩，并送了一份副本给我。我看了他写的材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林彪到沈阳。他到达前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司令员。民主联军的建立有统战意义，是由几方面的原部队组成的，包括关内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吕正操带的原东北军一部，周保中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等。周保中同志是随苏军进驻长春的，人们称他黄中校，因为他熟

悉东北情况，所以对苏军的行动起了顾问的作用。林彪到达前，由彭真、吕正操、肖劲光、程子华和我一起讨论民主联军的领导成员。彭真建议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肖劲光任第二副司令兼参谋长，我任第二参谋长。在讨论时，我说不要叫什么第二参谋长，就是副参谋长吧！但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仍旧照原来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我只得照章执行，尽力而为。开始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彭真和肖劲光工作。林彪到后，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已经进到山海关以西地区，当时，他们是我军在东北的一支最大的力量。由于情况紧张，林彪又组织了一个前线指挥所，带领少数人到山海关地区指挥部队的行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苏军正式向东北局提出，说根据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要我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国民党后面有美国撑腰，也坚持要进沈阳。我们不赞成苏军这样做，结果引起了我们与苏方的一场争辩。同我们打交道的苏军驻沈阳少将卫戍司令。这个人很粗暴，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彭真同志和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军的愿望，讲不应撤出的理由，他却只搬他们上面的指示，说不能讲价钱，必须这样做。最后他竟说，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同志马上抓住他这句话，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同他吵了一架。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答复我们说，这是苏方当时的政策所决定的，不是他们下级的事，他们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最后，我们不得不尊重苏方的意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东北局及直属部队有组织地撤出沈阳，向本溪转移。

开始撤离沈阳时，指导思想还离不开大城市，还是在沈阳附近转，先撤到本溪，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随着形势发展，又转到抚顺，在那里召开了抚顺会议。在那以前，对东北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从中央发来了毛主席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等和我。抚顺会议以后，考虑到北满形势比较好，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区都连成一片，东北局决定将指挥部机关向北满转移。还在本溪时，就派人到梅河口修了些房子，准备利用这个据点建立新的指挥机构。抚顺成了转移途中的跳板。会后不久，我们就到梅河口开始工作了。在那里成立了东北军区司令部，肖劲光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他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一到就召集各有关单位，布置了司令部的工作。

二、在军调部执行小组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九四六年底）

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饶漱石乘美方的专机到达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降落。因我们事先已得到通知，彭真、林枫、李立三与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去机场迎接，与饶漱石见了面。他向我们传达了北平军调部和叶剑英同志的意见，说要在沈阳成立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下属几个分组，小组成员由东北局派主要干部参加。彭真、林枫等同志研究后，决定李立三和我参加小组，并让我们马上随饶漱石乘飞机去沈阳，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就去了。

到沈阳后，第二十七小组正式成立，饶漱石任组长，李立

三任政治顾问，我是手下没有一兵一卒的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的代表叫赵毅，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中将师长，在抗日战争中同我们党有过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好。后来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发现他与我们的关系相当密切，对我们的斗争不坚决，很快把他撤换了。后来替换赵毅的叫蔡宗濂，东北人，也是中将。美方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是泰勒上校。第二十七小组下属几个分组：沈阳以东地区的抚顺方向，组长是莫文骅；本溪方向组长是肖华；沈阳以北地区的四平方向，组长是耿飆；沈阳西部地区组长是王首道。当时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尚未大批到达，我军与他们收容的地方部队经常发生小的冲突，小组会议上就为这些事天天争吵，总而言之是光吵架而得不出结论。

接着，我军在四平作战，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打了近一个月。因为战线太宽，敌人兵力远远超过我军，我们兵力有限，没有能够打好，不得不结束战斗。这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陆续进到沈阳和周围地区。我军撤出四平后，曾一度占领长春，并俘获了一部分敌人。但据当时局势，在长春也站不住脚，只得从长春撤出。接着又向哈尔滨撤退。最后只能以松花江为界，南岸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不过我们在江边留了一个据点，叫陶赖昭，放了一个连的部队，警戒江南的敌人。国民党部队进到松花江边，也就不敢再贸然前进了。撤出四平后，饶漱石调回北平，他在二十七小组工作只有一个来月。他走后，小组由李立三负责，我作他的副手。小组的位置也由沈阳迁到长春。我们住在比较小的东北旅馆里，国民党代表住中国旅馆，美国人的住处离我们很近，叫大和旅馆。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的主要部队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第六兵团，不过开始还没有兵团的番号。不久，东北局又将李立三调回哈

尔滨，小组的工作就由我主要负责了。那时小组除了参谋、电台、机要和行政人员一套班子，主要有两个翻译：一个是北京来的李汇川，他原是西南联大机械的，因为人不多，他还兼着秘书，小组的工作报告都由他草拟出来，向总部报告；还有个翻译是他的爱人周砚，他们原来订了婚，到长春后才正式结婚（他们现在都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二十七小组下属的分组也有了改变，原来抚顺、本溪和四平等地的分组都撤销了，重新成立了几个分组：德惠一个组，组长是袁任远；双城一个组，组长是高铁；齐齐哈尔一个组，组长是朱光。因为长春、德惠在国民党占领区里，国民党也在我们的双城等地放了两个组。

执行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双方军队的磨擦，实际上却天天吵架打官司，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布实行停战的那一天，我军占领了吉林市东边拉火车站，国民党指责我们违犯协议要我们退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一条原则办事，即枪杆子夺到的东西，决不能在谈判桌上放弃掉。还有一件事，国民党方面说中共部队正在松花江北岸准备渡江，想进攻长春。我们从内部知道并没有这个打算。军调部就派了一架飞机，由我代表中共，和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三方面共同去松花江上空视察。看了一番，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军要渡江，这样，国民党代表才无话可讲了。

小组内三方面都有翻译，一争论起来，我们的翻译最有本事。国民党的翻译名义上是个美国留学生，可是他在讨论时，什么问题都说不清楚。而美国人的翻译又不作口译，只做记录，结果全靠我们的翻译，把所争论的问题讲得很清楚，美国人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说国民党的翻译不是选拔出来的人才，而是靠关系来的。因为那个翻译的职位很高，他拿钱不少，而

水平却很差。那时差不多每天都开会，我们有问题总是据理力争，国民党的代表却毫不讲理。我们的女翻译周砚气得要命，说国民党怎么这样不讲理。我总劝她耐心一点，他们不讲理，我们要讲理。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小组还没有停止工作，一直继续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那时我们的三人执行小组也已无所作为，我向东北局提了个意见，建议派李初梨同志来当小组长，他当时正好没有什么事，东北局同意了，我便离开了军调部第二十七小组。

这期间经常有飞机在东北、北平和延安之间来往，我利用了一个机会，坐军调部的飞机从长春到了北平。在那里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叶剑英同志，他见了我也很高兴，约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在院子里一块照了相，还参加了晚会，气氛十分亲切。我到北平是为了等个机会去延安看看爱人和孩子。正好军调部又有飞机去延安，我就乘飞机回到了延安。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离开延安时走得很仓促，我爱人张毓兰同志正怀孕，延力还没有出生，她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生以后，我还没有见过她呢！我到家以后，一家人又终于团聚了，当然非常高兴。不过，张毓兰身体很不好，五个小孩中，曼曼、望生、连连、延力在身边，延力还不满周岁，天福还寄养在外边别人家里。因为我那时已在东北工作过一个时期，还希望到那里去，就同张毓兰商量，准备带他们一起去。开始同军调部的人讲好了，再搭他们的军用飞机，将我爱人和孩子一同带到东北去。谁知他们临时又变了卦，不同意带家属和小孩。当时也确实不方便，四个小孩，小的还不到一岁，我爱人又生着病。我们又商量，是不是把最小的延力暂时留下来，交给老百姓先带着，以后再来接。跟我们一起的公务员老吴，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见我

们想把延力留给老百姓，心里很难过，自告奋勇让我们把孩子交给他带。我们觉得他一个老头子带一个小女孩，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说，只要他不死，就一定把孩子带好。少奇同志生前说他的孩子是人民养大的。同样，我的孩子也是人民养大的。这个老同志从我一九四一年调回延安时，就分配到我身边来作公务员，我到现在还很怀念他。当时我们见他这么热心，就把延力交给了他，还买了些奶粉留给他们，组织上也帮助我们作了安排。但是当时我们仍然不能一起走，我又不能在延安久等，只好下决心独自先回北平。好在这时经常有飞机往返北平和延安，一九四七年初，军调部的董越千同志去延安联系工作，叶剑英同志交代他，帮助把我爱人和孩子带来。他果然替我们向美方交涉好了飞机，将她们母女四人带到了北平。到北平后，住在翠明庄，人多地方小，孩子们只好搭地铺睡。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过了春节，我让张毓兰同志到当时的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去检查，发现病情很严重，但是她很坚强。早在一九四五年我离开延安时，她就向我说：“我们孩子多，我也不想别的，只要把他们带好，也就尽到革命责任了。”她后来带着四个孩子，确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军调部正在解散，李初梨的爱人刘钧利用机会从长春来到北平，约我们观光一下北平。我们去了前门外、雍和宫等地方，领我们的是徐冰同志，我同他在莫斯科就相识，比较熟悉，他又是北平人，正好作我们的向导。以后，我们从北平搭飞机去哈尔滨，乘的是一架美国双引擎飞机。起飞以后不久，一个发动机失灵，机上人员都很紧张，赶紧系上降落伞。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惊慌的，刘钧同志也很沉着，她还帮助我们照应孩子，因为飞机上冷，她让孩子躺在飞机过道上，用被子盖上。飞机发生事故了，我想自己虽然带了降落伞，是死是活

也很难说，几个孩子就更难想象了。那几位美国飞行员还比较负责，说我的三个孩子没有带降落伞，到发生问题时，可以由他们负责一人带一个跳下去。尽管后来采取了措施，赶紧飞回北平，飞机总算安全降落，没有跳伞，但当时能这样说还是难能可贵的。北平机场迅速准备好另一架飞机，重新起飞，我们一家和同行的十多人一起安全到达哈尔滨。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这样靠党和群众的关怀在战斗的环境中逐步长大的。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牢记党和群众的养育之恩。我也希望千万个干部子弟都能这样做。

三、在东北军区

（一九四七年初——一九四九年底）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们到达哈尔滨，正是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时候。我们在招待所住下，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林彪主持东北工作，从内战时期起，到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总部，我都和他有过接触，一直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这时，他已任命了原来一军团的、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当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我回来后仍然是参谋长，分配主管军工生产。我当时很希望到部队去锻炼，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说到部队锻炼总有机会，根据部队长期的经验，战争的规模越大，军工生产就越是重要，还是希望我去干。那时人们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事。罗荣桓同志说得有道理，我就接受了任务，管起了军工生产。

我们没有成立专门机构，只找了两个秘书，一个是徐良图（现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个是任忠浩。我们的基本工作方式是到各个军工基地去了解情况，就地指导工作，实行面对面领导，随时解决问题。那时有哈尔滨、北安、鹤岗、鸡西、牡

丹江、琿春和大连共七个军工基地，能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〇炮、火药等，条件最好的是大连军工厂。当时大连是受苏军管制，他们对我们还是支持的。这几个军工基地我每个点都跑到了，随时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我一直带着秘书任忠浩到处跑，留徐良图在家坐镇，整理有关文件和材料。各个点的负责人我记得有如下几位：哈尔滨是王盛荣（现在武汉），鹤岗是王逢源（后来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已病故），鸡西是乐少华，琿春是韩振纪（后来是驻苏中将武官），牡丹江是王厂，大连是朱毅（抗战初期在河南当县长，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以后转到东北搞军工）。我们都认为自己这项新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一年半，有一半时间在外面到处跑，只有一半时间在哈尔滨为各军工厂做计划，搜集、采购和提供各种原料。后来，东北局看我们忙不过来，正式成立了军工部，调来何长工任部长，王逢源和江泽民任副部长，马文任政治部主任，我是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那时职务高低无所谓，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就干，业务不懂就钻，受了党的委托就认真工作，靠这种精神，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的。

一九四八年夏，我到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去，那里是东北最大的军工基地，对外叫“建新公司”，由朱毅任经理，张珍任副经理，在技术上主要靠张珍，他很懂得一套。厂里生产是多方面的，除了子弹、炮弹和火药外，还生产六〇炮。那里还出过一个英雄人物，就是吴运铎同志。他就是在那里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我在那里还参与处理过一个问题。当时负责旅大地方工作的是韩光同志，他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我听了一些反对意见，觉得不对头，如说他在旅大没有独立的政策，是苏联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旅大是苏军管制的，你和他们对抗，另搞一

套行吗？我看这些意见都根据不足。因为我当时是东北局委员，军区参谋长，又是老同志，韩光特别希望我讲讲公道话。正好何长工同志、李一氓同志也在。李一氓同志还是个大秀才，他下笔很快。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把我们要讲的内容在一个晚上写出来了，第二天由我在会上讲，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少数人不赞成。以后总有人说我有偏向，支持了韩光。但是就今天看，我认为对干部的一般性缺点抱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对的。

这一期间，我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的爱人张毓兰同志一直病很重，到哈尔滨后找了一个日本大夫为她治疗。大夫每周来一次，每次都用汽车接送，也给了他相当的报酬。但是他对我说，病情很严重，最多还可以活半年，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却不能告诉病人。大夫每周来给她吃一些药后又好一点。以后又请了一个奥地利医生，他看了以后直叹气，说病已经难治了。就这样，拖了整整一年，治疗无效。一九四八年初的一天夜晚，她病逝了。临终前我在她身边，她自己也很明白，对我说：“我不行了，你坐在我床边，看看我！”我说不出话，坐着，看着她闭上了眼睛。我意识到她去世了，心中充满了悲哀！张毓兰同志是陕北葭县人，一九三五年就参加革命并入了党。她为了使她集中精力搞好工作，长期承担着全部家务和教养子女的重任，终于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去世的当晚，我没让孩子们知道，天亮后先通知了管理处，因为那时还没有火化的习惯，请他们帮助我去买口棺木。他们马上办妥了，我们就为她入殓安葬。在身边的三个孩子知道了，哭得好厉害。我让孩子们和妈妈的遗体一起照了相，将她安葬在哈尔滨的一个叫“极乐园”的教会墓地，为她立了碑，围了个圈圈，上面还有个带红五星的架子。解放以

后，此处墓地整个迁到郊区，连围圈和红五星都迁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我去哈尔滨还去看过这处墓地，就在大路旁，很容易找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哈尔滨又来通知，说那处墓地也不能放了，遗骨都得火化，我当然只好同意，后来在那里放了一个骨灰盒。这是我个人家庭的一段悲剧。

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东北我军进行了辽沈战役。为了作战便利，指挥机构分为前方后方，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前方，高岗主持后方工作。我被调回军区司令部，协助高岗工作。对于这次战役，毛主席从战略方针到作战部署，曾作了一系列的具体指示。但是，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林彪，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一直采取了犹豫、拖延以至抗拒的态度。毛主席一开始就指示东北我军应首先将主力调到辽西地区，占领锦州等战略要点，切断北宁线，对东北和华北蒋军实行战略分割，把蒋军卫立煌集团共约五十余万兵力封闭在东北境内，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加以各个歼灭。林彪却要我将军主力留在北线，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并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直至毛主席对他作了严厉的批评，令其迅速攻取锦州，并对战役的实施一一作了具体部署，林彪才不得不将自己的指挥所挪至阜新，按毛主席的指示对锦州发起了攻击。十月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十八日，长春守敌被迫放下武器。我军又于黑山、大虎山地区包围了企图西援锦州的蒋军廖耀湘兵团。

这时，我们分析了战局的发展形势，认为困守在沈阳等地的东北残敌，为逃避被我军全部围歼的命运，在北宁线被切断之后，有很大可能从营口由海上逃跑。为此，高岗和我于十月十九日联名发电报给林彪，指出敌人向营口突围从海路南撤的可能，建议迅速调动部队，抢先占领营口，以堵塞敌人的退路，并具体建议以第十二纵队外加三个独立师，由四平以北乘火车于